

由它们的内容，而是消极地由它们跟系统中其他要素的关系确定的。它们的最确切的特征是：它们不是别的东西。”因而语言的价值不完全是音响形象与概念的联结，还要放在语言的系统里去体味语言的价值。

从所指（物质）方面讨论语言的价值，与在概念方面相似，同样是只由它与语言中的其他要素的关系和差别构成。即使声音是我们接触的最直接的要素，但是声音本身并不代表意义，重要的还是被人们赋予差别的部分。任意和表示差别是两个相关联的素质。声音和概念的联系不是必然的，二者的结合具有任意性，就像我们很难找出“人”与“rén”之间的关系一样，尽管有些人认为“人”的读音来自“仁”，但这也有可能是一种牵强的比附，因为我们也不知道“仁”为什么会和“rén”联系在一起。关于表示差别，我们可以通过发声部位、声调的高低等因素来判断在一种语言中发声人想要表达什么概念。比如说在标准的普通话中，我们不会把“师”理解成“撕”，也不会把“走”理解成“揍”，在不影响表意的情况下，我们还有普通话的变体，不过这种变体还需要维持在普通话的系统内，否则会使得让人难以理解。声音的差别具有系统性，《教程》中以希腊语“ephen”（我以前说）与“esten”（我放置了）为例，两者构成方式相同，但是时态不同，前者为未完成过去时，而后者为不定过去时，可见“这些符号不是通过它们的内在价值，而是通过它们的相对位置而起作用的”。

任何约定的价值都有不与支持它的、可以触知的要素相混的特点，我们可以把这一原则应用到语言的一切物质要素。以音位为例，音位是一些对立的、相关的、消极的实体，音位中每个要素都是界限分明的单位，它们的数目也是完全确定的，彼此之间也不相混淆，除此以外，说话人能够享有发音上的自由。在文字的系统里，这个原则也同样适用：文字的符号是任意的，字母的价值纯粹是消极的和表示差别的，文字的价值只靠它们在某一个由一定数字的字母构成的系统中互相对立而起作用，符号怎样产生是完全无关轻重的。

从前面的内容，我们可以得知语言中只有差别，这种差别有消极的要素相互区分产生语言系统，语言系统才能由此发出概念差别和声音差别。因此，“一个符号所包含的观念或声音物质不如围绕着它的符号所包含的那么重要”。我们从整体来把握符号，符号是语言系统的反映，“语言系统是一系列声音差别和一系列观念差别的结合，但是把一定数目的音响符号和同样多的思想片段相配合就会产生一个价值系统，在每个符号里构成声音要素和心理要素间的有效联系的正是这个系统”，符号是所指和能指的结合，属于相对积极的要素。有区别的观念的总数和表示区别的符号的总数在原则上是一致的，如果存在任何观念上的差别，只要被人们感到，就会找到不同的能指表达出来；如果有两个观念，人们已感到没有区别，也会在一个能指里混同起来。比如说“菠萝”和“凤梨”，两者存在地域性的差别，但是再有的人看来，二者是同一属种，在称呼时就会出现把“菠萝”和“凤梨”两个概念混用的现象。如果我们把符号互相比较，两个符号各有所指和能指，这是它们之间存在的不是差别，而应当说是区别、对立，例如“黑”与“白”的对立。

这一章的末尾对单位和语法事实进行了阐述。单位是语链中与某一概念相当的片段，单位的性质与价值类似，都纯粹是表示差别的，“单位的特征与单位本身相合”。这样容易造成把“语法事实”同单位的定义混淆的结果，因为二者都有表示要素对立的特点。语法事实中的每一个要素本身都是由系统内部的对立作用构成的，我们也可以从语法事实开始来研究单位的问题。但是单位和语法事实都只是用来表示同一个一般事实（语言对立的作用）的各个方面的不同名称，切入的角度不同，所以不能简单地认为它们相同而把它们混为一谈。“如果语言符号是由差别以外的什么东西构成的，那么，单位和语法事实就不会相合。”语言是复杂的，语言系统内部的联系是盘综错杂的，不会存在绝对的简单的东西。语言是形式，而不是实质。如果我们先入为主地认为语言有什么实质并从中入手的话，将会产生不正确的结论，不能很好地反映语言的特征、价值。要对语言的形式进行全面、深刻的剖析，才有可能发现语言内部规律所在。

《普通语言学教程》第四编：地理语言学阅读心得

2020 级汉基 2 班马晓琪

语言现象是丰富而复杂的，综合各种语言的研究成果，归纳成语言的一般规律，这就是理论语言学的任务。理论语言学，也称普通语言学，是关于语言的一般规律的理论研究。

在阅读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一书时，我着重选读的是第四编：地理语言学。那么，究竟什么是地理语言学呢？根据百度百科的定义来说，地理语言学是指从地理学的角度出发，专门以绘制地图的方式来研究语言或方言的地理分布和差异的学科。它把某语言集团的地理位置和该语言集团的历史发展联系起来研究，阐述一个区域中某地区的语音、语法和词汇在类型上是怎样相似的，在此基础上研究语言或方言的分类，以发现语言变迁的痕迹。其目的是研究语言的历史。在语言的一般规律理论研究下，最先引人注目的是语言的差异，最先看到的，便是地理语言学的差异。无论是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还是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我们首先注意到的便是语言上的差异。

地理差异具有复杂性。在我从前的认知下，世界上有多少个地区就会有多少种不同的语言，因为地理上的分隔始终是语言差异的最基本的因素。但是在我阅读了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后，我发现有扰乱这种认知的现象，存在几种语言在同一地区并存的事实。

首先，一种新来居民的语言有时会凌驾土著居民的语言之上。按书中的举例来看，在爱尔兰，人们说克勒特语和英尼语；许多爱尔兰人都懂这两种语言。在布列塔尼，人们通用布列塔克语和法语；在巴斯克地区，人们同时使用法语或西班牙语和巴斯语。在芬兰，长期以来，瑞典语和芬兰语并存；晚近还加上了俄语。在库尔兰和利沃尼亚，人们说拉脱维亚语、德语和俄语。德语是中世纪由汉萨联合会庇护下的殖民者输入的，仅属居民中某一特殊的阶级；俄语却是后来由于征服而输入的。在立陶宛，除立陶宛语以外曾移入了波兰语，那是立陶宛在古代同波兰结成联盟的后果，以及俄语，那是立陶宛并入莫斯科帝国的结果。直到十八世纪，斯拉夫语和德语还流行于德国自易北河起的整个东部地区。在某些国家，语言的混杂更为厉害。在马其顿，我们可以碰到一切可以想象到的语言：土耳其语、保加利亚语、塞尔维亚语、希腊语、阿尔巴尼亚语、罗马尼亚语等等，混杂的情况随地区的不同而不同。

这些举例属于一种新来居民的语言有时会凌驾土著居民的语言之上，大多数为殖民的缘故。我们再把关注转到国内。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为例，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现有 56 个民族成份，主要居住有汉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回族、蒙古族、柯尔克孜族、锡伯族、塔吉克族、乌孜别克族、满族、达斡尔族、塔塔尔族、俄罗斯族等民族。因此在整个新疆的土地上，人们说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锡伯语、色勒库尔语、乌兹别克语、达斡尔语、塔塔尔语、俄罗斯语等等。

语言是没有自然界限的。这些语言并不总是绝对地混杂在一起，也并非绝对地区划分明。它们在某一地区并存，并不排除有相对地地域分布。例如两种语言中，可能一种流行于城市，一种流行于乡村；但这种分布并不总是泾渭分明的。

通过历史的学习，我们可以得知，语言的重叠大多数情况下是由一个力量占优势的民族入侵引起的，同时有的也因殖民、和平渗透，其次就是游牧部落把它们的语言带到各地而引起的。殖民、和平渗透更多的存在于强国对弱国，我国则更多的是游牧民族将自己的语言带到各地。

语言事实的传播，同任何习惯，比如风尚一样，都受着同样一些规律的支配。每个人类集体中都有两种力量同时朝着相反的方向不断起作用：一方面是分立主义的精神，“乡土根性”；另一方面是造成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力量。“乡土根性”使一个狭小的语言共同体始终忠实于他自己的传统。这些习惯是一个人在他的童年最先养成的，因此十分顽强。在言语活动中如果只有这些习惯发生作用，那么将会造成无穷的特异性。

随着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的交流日益频繁，这时，人们便会通过某种默契选出一种现存的方言使之成为与整个民族有关的一切事务的传达工具。选择的标准是各种各样的：有时选政治领导权和中央政权所在地的方言，有时选文化最先进的地区的方言，有时则是一个宫廷把它的语言强加于整个民族。在此生活的大部分居民会成为能说两种语言的人，既说全民的通用语言，又说地方上的方言。例如中国的“推普”。推普，是推广普通话的简称。推广普通话宣传提纲和宣传口号，由全国推普周领导小组办公室 2005 年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规定普通话是国家通用语言。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同时，为了抢救我国濒危少数民族语言，国家正在通过加强双语教育、资助研究课题等保护措施，保护濒危少数民族语言。同世界许多国家一样，中国也有一些少数民族语言正处于濒危状态，如畲语、仡佬语、赫哲语、鄂伦春语、鄂温克语、裕固语、塔塔尔语、土家语、满语等。对濒危的少数民族语言，国家一方面贯彻语言平等政策，加强双语教育，为一些濒危语言的教学和使用尽量创造有利条件；另一方面在资助研究课题方面给予倾斜，如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支持的课题有《中国空白语言调查研究》《中国濒危语言个案对比研究》等。由此可见，虽

然我国大力“推普”，但是普通话又没有窒息各民族语言和方言，同时还消除语言隔阂、促进社会交往、维护国家统一、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是符合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的伟大举措。

其实在阅读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这本书时，我发现其中举例几乎都是除中国以外的国家地区。此书成书于 1916 年，1916 年的中国处于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国内政局混乱，外受帝国压迫，对于做学问做研究来说是很艰难的。课上听老师提到，中国的语言学研究本就起步晚，地理语言学更是如此。地理语言学于 20 世纪 40 年代由比利时神父贺登崧传入中国，但与现代汉语语法学、音韵学等不同，地理语言学在中国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贺登崧的研究并没有在中国开花结果。

究其原因，不外乎以下几点：其一，汉语本身的特点。汉语作为音节表意的语言，意义的基本单位是一个一个的音节，而来源于西方语言研究背景的地理语言学面对的是一个一个的词，所以基于西方印欧语，从以词语的调查为基础的地理语言学出发对汉语方言进行研究难免水土不服。其二，汉语的研究传统。中国传统的治学方式重文不重言，即重视古典文献，轻视活的语言。贺登崧则以活的语言为研究对象，这在当时与中国的研究传统大相径庭。其三，中国地域广阔，方言众多且极其复杂，如果没有前期对汉语方言大量的调查作基础，地理语言学很难发展起来。其四，贺登崧所处时代极其动荡的社会环境不利于地理语言学在中国的开展。

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汉语方言得到了比较充分的调查描写，方言的历史比较也有了很大的进展，这些都为地理语言学在中国的新发展创造了条件。

但是我们应该清楚的是，地理语言学是在西方语言背景下产生的语言学理论，如果把它照搬过来套用在汉语上，难免会出现不合适的情况。我们在今后的研究中应当做到地理语言学的本土化。合理吸收西方地理语言学的理论与方法，结合汉语的特点，走本土化道路，是地理语言学在中国发展的必由之路。通过与汉语方言学研究传统的结合，对经典的地理语言学理论及方法进行符合汉语方言实际和研究传统的改造，不断丰富汉语地理语言学理论内涵，补充构建符合汉语实际的地理语言学理论，以推动汉语地理语言学研究不断深入。

参考文献：

[1] 新华社中央政府门户网站.《国家正通过双语教育等措施保护濒危少数民族语言》.2007 年 05 月 08 日

- [2] 李建校.《地理语言学在中国的本土化》.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 年/7 月/23 日/第 003 版
- [3] 弗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

读书报告——《普通语言学教程》第一部分：一般原则

2020 级汉基 2 班毛温仪

书籍：《普通语言学教程》

节选阅读内容：第一部分：一般原则

作者：费尔迪南·德·索绪尔

译者：刘丽

校译：陈力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年月版次：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一、作者简介

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 ,1857-1913），祖籍法国，生于日内瓦，瑞士作家、语言学家。他毕生致力于语言教学和语言科学研究工作，1891 年从法国回到日内瓦，担任日内瓦大学的梵语和印欧语常任教授，并于 1907 年-1911 年先后三次讲授普通语言学课。他去世后，由巴利（Ch .Bally）和施薛蔼（A. Sechehaye）根据他普通语言学授课时学生的笔记、他的教案以及相关的材料整理编辑出版《普通语言学教程》。索绪尔是现代语言学的创始人，被称为语言学之父。他整理并且重新组织起对语言和语言本质的研究，提出语言学研究的新方向和新的方法论，开创了语言符号学，促成结构主义的诞生。

二、全书提要

《普通语言学教程》全书分为七个部分：序言、附录 音位学原理、一般原则、共时语言学、历时语言学、地理语言学、关于回顾语言学。“编排的顺序很可能不符合索绪尔本来意图，因而没有反映出其论点的逻辑顺序”，但总体来说还是取得成功。这本著作使得索绪尔研究语言新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流传后世，奠定了现代语言学和符号学的基础。全书涉及到众多抽象的理论，其中作者重点理论的提出集中在序言、一般原则、共时语言学这三个部分。书中要点包括：语言和言语、内部语言学和外部语言学、共时和历时、系统与价值理论、语言符号和符号的任意性、句段关系和联想关系（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等。第一部分——一般原则主要讨论了语言符号的本质、符号的不变性和可变性、静态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

三、心得评论

第一章中，索绪尔提出语言的本质——符号、能指、所指，“语言符号是一个和心理相关的两面实体”，即概念和音响形象。音响形象它是存在于我们心中的，是一种感官性的体验，是“心理印迹”。而概念则是抽象的，不是独立存在的实体，而是存在于系统中的一部分，它的存在是需要系统中的其他差别对立的关系部分来确定的。“两面实体”是就语言这一系统来说的。只有当概念和音响形象在一个系统中，并且相对立，才能构成两面实体，单一的概念或者单一的音响形象都不能脱离系统而独立存在，它们“只能作为符号的组成部分而存在”。“概念纯粹是表示差别的”，例如我们要确定不同的车型，只有将一辆具体的车

放到和其他相差别对立的车，我们才能具体地指称这一辆车。索绪尔将概念和音响形象的结合体称为“符号”，用“所指”代替概念，“能指”代替音响形象。所指和能指，两者体现了联系的相对性，构成了语言符号的两面。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将语言学和符号学结合起来，为语言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

索绪尔指出“能指和所指之间的联系具有任意性”，即语言符号具有任意性。在论述过程中，提到任意性是否应该包括基于纯自然符号的表达模式。我认为符号的任意性是应该包括纯自然符号的。如肢体语言也是一个社会集团或者集体所约定俗成的表达方式，在还没确定下来之前，纯自然符号都是具有任意联系性的，但一经社会集团确定下来，便具有相对的确定性和强制性，人们只能被动地接受。

“完全具有任意性的符号能更好地实现符号化过程的理想”，这句话应该与强制性和普遍性联系起来，如果没有强制性的普遍应用，那么就会造成语言符号应用的乱象，当然也就不能构成一个整体稳定的系统，即书中所提到的，“一旦符号已经在语言社团中被确立下来，任何个人都很难对它进行任何改变”。在提到反对原则任意性的时候，索绪尔提到了拟声词和感叹词这两种特例。除此之外，我想到，在世界上，大多数孩子在学习语言时，发出“妈妈”（/ma⁵⁵ ma²¹/）的音。这个现象是符合孩子发音的规则。“/ma⁵⁵ ma²¹/”最先可能是表示温暖和事物，后来语言社团逐渐赋予了其最亲密的人——母亲的含义，类似的还有爸爸的发音。这些发音的特性，能指和所指是不是也是语音演变的偶然结果呢？我认为这种联系不是任意性的，能指和所指之间在语言的社会集团确定下来时，应该考虑到能指和所指之间的一种亲密的联系。符号是否具有任意性？我认为是值得商榷的。思维、观念、民族文化与语言是相互影响的，在研究语言符号时，尽管人是社会动物，但我想，符号的发展是不能脱离“人”这一主体性的存在的，语言学的研究应该将一定的注意力放到语言符号的使用者方面。

原则2介绍的是能指的线性特征。能指是听觉上的，表示时间的跨度以及这个跨度只能在一个向度上测量，是一条线。在第一部分中索绪尔对于能指的线性解释是较为粗略的。能指的线性是一个向度的，是一个序列。同时语言是一个系统，成分是他们在系统中的相互关系组成的，那么就可以根据其特性引申到语言的句段关系和联想关系，即语言的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在语言状态中，一切都是以关系为基础的。”在言语的链条上，一个个要素排列形成不同的组合，构成序列单位之间的关系；而在话语之外，具有某种相同点的要素又类聚在一起，产生互有区别又相互替换的关系。能指的线性特征，将言语从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方面切割成多个层次，由此生成言语的层次分析法。值得注意的是，索绪尔对言语进行分析时，往往侧重的时语音和语法层面，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句法层面的分析，“没有把句子纳入语言系统，而是把句子看作是言语行为，对句法的认识显得特别薄弱”。

在第二章中，索绪尔提出了符号的不变性与可变性。“能指，尽管看起来能够自由地用来表示一个概念，但是实际上当被语言社团所使用后，它就会被固定下来，并不那么自由了。”这就回到了他所定义的，语言是一个系统，是由关系组成的。索绪尔提供的是一个新的研究角度，就如前面所说，语言是由社会力量和时间所决定的。虽然在这本著作中，索绪尔没有系统地提出“结构”一词，但其研究的方法则是从宏观，从整体结构性来入手的。语言法则一旦被社团所接受，就具有一定的强制性，而处于其中的个体则需要接受。这就好比，在汉语中，个人在社团中进行言语活动时，不能将“马”这一个音响形象应用到“牛”这一个抽象的概念中。即使个体成员不接受也得非自愿接受，否则便脱离了这个语言系

统，无法进行有效的言语活动。正如社会制度、习俗，一旦形成，对于处在这个社会中的个体便具有普遍性和强制性的要求，进而形成一种社会契约，规范者每一个社会成员，在一定程度上以此来维系社会的运转。“没有一个社会集团知道或者曾经意识到语言其实就是上代的遗产，而且我们必须接受。”我个人对于这句话是不完全认同的。这句话与索绪尔在著作中一直强调的应该侧重于研究语言的共时性理论是呼应的。但它割裂了接下来要论述的语言的共时性和历时性。在我看来，语言学的真正对象不仅仅是现存语言的正常规律，或者说是某一个阶段的语言状态，还应该包括历时性的发展。

在可变性方面，语言总是变化的，所代表的事物和本身的形式可以随时间的推移而改变的，也指概念和音响形象之间的关系的变化。“时间保证了连贯性”，尽管说话者不能改变语言，但其实语言是在不断地变化，彰显的是语言的生命力。柴门霍夫所创立的世界语及其一系列法则，在创立之后便独立于社会集团中。我想，其若能够被语言集团所接纳和使用，那么世界语及其法则便处于不断之中。无论是柴门霍夫还是集团中的个体都是无法阻止的。“语言在任何时候都绝不会离开社会现实而存在，因为它是一种符号现象。它的社会性是它的内在特征之。”

索绪尔的静态语言学和动态语言学是开创性的，将二重性的时间因素引入到语言学的研究当中，为语言学的研究开辟了新视野。首先引入“语言是一个纯粹的价值系统”，而价值是来自系统中关系的对立和差别。价值系统的复杂性、组织的严密性要求根据轴线来进行语言研究。可以看到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索绪尔将横轴，静止的表示为共时，将变化的表示为纵轴。由此，共时性指的是语言的状态而历时性指的是演变阶段。在第一部分：一般原则中作者论述了静态语言学和演变语言学的二重性、法则和区别。共时和历时概念的提出是有创造性的，从语言学纷繁复杂的研究抽离出主干和要点。同时，索绪尔主张严格区分共时和历时的关系，并且认为共时比历时重要，是研究的重点，“因为对于说话大众来说共时性才是唯一真实的现实性”。而历时性，则具有前瞻和回顾两种图景。从整本书看来，作者的讨论中心侧重在共时性，历时不过是帮助了解从一个共时状态到另一个共时状态的形成历时背景。在100页末作者认为“历时观点和共时观点之间的对立是绝对的，不容许有任何妥协”。这种说法未免过于绝对，尽管共时性对语言研究作用显著，但两者的关系并非是完全割裂和对立的。在今天的现代汉语中仍然保留了许多古代汉语的法则，如短语中的偏正结构，名词的活用。了解每一个共时状态的同时，我们需要从多个语言是事件当中，发掘多个共时状态的变化，从而总结出现存语言系统与古代的联系。完全孤立和割裂多个语言事件，过渡区分两者的关系，忽视历时性的研究，对于句法和语法规则的研究解释是有缺漏的。“历时的介入只能使它的判断出现偏差”，是一种狭隘的偏见，历时的恰当介入才会使得语言学研究更加全面和解释更加有力。符号的任意性是其他语言学研究的支点，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决定了不作泛时性的综合分析。

四、总结

索绪尔提出了现代语言学基本的研究方向，阐明语言学的任务，尽管部分具体的观念并非他所独创，但他的研究承前启后，使语言学研究发展成熟。他的整体性结构的研究方法和一系列语言学理论有着重大的建设性，为后来的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个学科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和新的方法论，也为语言学的学习和探索提供了新方向和方法论。然，索绪尔整体结构性的符号语言学研究是众多研究视角中的一个。对于我们语言学的学习也不必仅仅局限于单一的角度，应该

怀有质疑和批判的心态，具备创新和突破的精神。如后来的乔姆斯基，同为伟大的语言学家，最先打破了结构主义。他指出“语言不仅仅被看作是符号系统，还被看作是交际工具、社会文化现象，思维认知产物”，认为语言是作为多维本质的体现。

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有几个疑问仍待去探索和讨论的。首先，符号的任意性问题除却拟声词和感叹词，是否应该有更多的例外？其次，在著作中历时和共时的关系被严格的割裂和区分，而历时不一定就如同索绪尔所说的只是为研究共时状态提供的历史背景，语言学历时性的作用应该得到深入的研究，反对书中语言和言语、共时性和历史性的二元对立。再者，索绪尔将句子当作是言语活动，忽视了对句法的研究。同时，在著作中，索绪尔所举例子多数为语音规则，并且归属于印欧语系，那么汉语是否为符号语言学的例外，又或者即使汉语不属于例外，是否存在其他的语言系统对索绪尔语言学理论的突破。最后，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中语言的符号系统是处于一个理想的状态。符号，作为一种抽象的客体，不应当忽视了“人”、“民族”、“文化”、“思维”等要素。索绪尔的现代语言学研究不是终点，而是作为研究语言学的新起点，未来语言学的研究仍待探索……

参考文献：

- J. 卡勒. 索绪尔[M]. 张景智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9
- 王铭玉, 于鑫. 索绪尔语言学理论的继承与批判[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13, 45(03): 363-373+480.
- 张一兵. 索绪尔与语言学结构主义[J]. 南京社会科学, 2004(10): 1-8.
- 索振羽. 索绪尔及其《普通语言学教程》[J]. 外语教学与研究, 1994(02): 51-56.
- 潘志刚. 索绪尔的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J]. 求索, 2009(06): 194-196.
- 聂志平.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中的语言符号学思想[J]. 浙江师大学报, 2001(06): 100-104.
- 李葆嘉. 论索绪尔符号任意性原则的失误与复归[J]. 语言文字应用, 1994(03): 22-28.

读书报告

2020 级汉基 2 班木尼热古丽·塔西铁木尔

普通语言学教程绪论回顾了语言学历史，交代了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以及其与其他科学的关系，理清了语言和言语二者中语言学的分别以及语言的内外要素。概述了语言的文字表现以及音位学。

首先，语言学经历了最初研究语法，到科学研究运动中的语文学，以及最后比较合理完善的比较语文学。这三个阶段虽然对语言学的形成和完善都有一定的作用和贡献，但都在一定程度上有其自身的不足需要完善。最初研究的语法，是以逻辑为基础的，注重区分错误和正确，且缺乏科学的方法，这最终使其成为规定性的学科，其视野过于有限。到了十八世纪，语文学盛兴。但语文学不单单研究语言，还研究了文学历史、习俗和制度，且其更侧重于考证、解释和评论书面文本。语文学家们对不同时代文本的研究奠定了历史语言学的根基，使得语言学向更广阔的视野发展。然而，它也有拘泥于书面语言、过分关注希腊语和拉丁语等不足之处。到了第三阶段，比较语文学在语言学历史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学者们将语言进行相互比较，并认识到对有亲属关系的语言进行比较是可以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研究内容的。其中值得一提的是语言学家葆朴，他将梵语和日耳曼语、希腊语、拉丁语放在一起比较，道出了希腊语和拉丁语与梵语之间的相似性——不管从变格还是从语法上来说，梵语与希腊语和拉丁语之间都是有相似性的——但梵语在语音系统上没有保留原始型特征，因此梵语在语音系统上无法与此两者产生可观的联系。除葆朴以外，还有马克思·缪勒使得比较语文学流行开来，古尔替乌斯将比较语文学和古典语文学联系起来，使得其内容更加丰富，施来歇尔则系统整理了这些繁琐的成果。至此，语言学开辟了一片硕果累累的新领域，但因没有成功探索出研究对象的本质，所以没有建立起真正的语言学科。比较语文学注重比较而忽视历史，使得其结论更难获得。这种绝对的比较方法引发了一系列没有现实根基的错误观念，由于无法反映言语事实，其推论往往荒谬不堪。后来，语言学家们发现比较只是构拟事实的一种手段。对日耳曼语和罗曼语的研究，使比较研究在语言学获得恰当地位。最后，新的一个学派——新语法学派的出现将比较研究的结果放在历史背景下，使得语言不再被认为是独立发展的有机体，而是语言集团集体意识的产物。通过诸如此类语言学家们的研究与自省，语言学不断丰富完善，即使到后来新语法学派也存在一定程度上的缺陷，但不断壮大的语言学越来越成为人们学术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方面。

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是由人类言语的全部表现形式构成。语言学描述和探究所有语言，追溯语系的历史，构拟每个语系的母语；它还确定语言中普遍地永恒的力量并推导出概括性的一般法则，自身确定界限并下定义。语言学与声音生理学、社会心理学以及语文学等其他科学有这紧密的联系。最后，至于语言学的用处，它对一般修养的重要性非常明显，讲话在现实生活中是比任何东西都重要的，因此其广泛影响显而易见，但这也会成为一些荒谬推论的来源。总之，语言学的研究对象以及与其他方面的联系都是非常广泛的，需要学者们不断研究以便利人们的生活及研究。

寻找语言学完整而具体的对象是困难的。在语言学中，对象并非像其他学科一样预先确定而先于观念存在，而是由观念创造的，所以观念与对象相互依赖、相互联系。例如听觉印象和发声器官是紧密联系的，一个声音和概念相结合，形成生理——心理单位，言语是个人和社会两个层面上的，且言语的现在和过去有所区别两者又紧密相连相互影响。不管从哪个方面出发，我们都无法得出语言学完整的对象。语言是言语能力的社会产物，也是一套必要的规约。语言是一个自足的整体和一套分类原则。语言学家的研究或正或反的表明了发音的机能借助于某种集体范式并提供给个体使用的工具才起作用。从语言事实发生的客体和过程